

## 故宫博物院道德教育功能初探

房尚文<sup>1</sup>, 岳尔雅<sup>2</sup>

<sup>1</sup>深圳职业技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广东深圳  
<sup>2</sup>广西财经学院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学院 广西南宁

**【摘要】**国际博物馆协会明确教育为博物馆首要职能并强调道德导向。本文以故宫博物院为对象,探讨建筑、玉器、陶瓷的道德教育功能:建筑彰显“和而不同”的文明智慧,玉器具象化君子人格与德政理想,陶瓷实现道德规范日常化。研究表明,中华文明历来“物以载道”,将道德律令熔铸于器物。故宫博物院作为“立德”的物质载体,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价值。

**【关键词】**故宫博物院;道德教育;物以载道;和而不同;人类命运共同体

**【收稿日期】**2026年2月16日 **【出刊日期】**2026年3月30日 **【DOI】**10.12208/j.ssr.20260084

###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moral education function of the Palace Museum

Shangwen Fang<sup>1</sup>, Erya Yue<sup>2</sup>

<sup>1</sup>School of Marxism, Shenzhen Polytechnic University, Shenzhen, Guangdong  
<sup>2</sup>School of Big Data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u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Nanning, Guangxi

**【Abstract】** The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s (ICOM) explicitly designates education as the primary function of museums, emphasizing its moral orientation. Taking the Palace Museum as a case stud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moral education functions embedded in its architecture, jade artifacts, and ceramics. The architectural layout manifests the wisdom of "harmony in diversity" (*he er bu tong*), jade objects materialize the Confucian ideal of the "gentleman" (*junzi*) and virtuous governance, while ceramic artifacts facilitate the quotidian internalization of moral norms. The study reveals that Chinese civilization has historically employed "objects as vehicles of moral principles" (*wu yi zai dao*), casting ethical imperatives into material culture. As a tangible carrier of moral cultivation (*lide*), the Palace Museum holds significant value for constructing a global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Keywords】** Palace Museum; Moral education; Material culture embodying moral principles; Harmony in diversity;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国际博物馆协会对博物馆社会角色的认知经历了持续深化。2007年维也纳第21届大会重新定义博物馆功能,首次将教育列为首要职能,并强调其社会责任;2022年布拉格第26届大会进一步修订定义,明确“符合道德的导向”(ethical commitment)是各项功能的共同价值基础,规定“博物馆以符合道德且专业的方式进行运营和交流,并在社会各界的参与下,为教育、欣赏、深思和知识共享提供多项体验”<sup>[1]</sup>。这一演进表明:教育不仅是博物馆的核心功能,更是其履行社会责任的根本途径;而所有业务活动都必须在道德与专业的双重规约下展开。

故宫博物院作为中国最重要的博物馆,亦是世界上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宫殿建筑群。其建立在明清两代皇宫收藏基础之上,现存文物186万余件(套),其中90%以上属国家珍贵文物,占全国文物总数的六分之一,品类齐全,涵盖中国古代文明发展的各个时段与各个门类。无论是建筑格局、玉器陶瓷,还是书画典籍,这些文物珍品共同构成了中华道德教育的资源宝库,潜藏着丰富的伦理教化价值与道德阐释空间。

#### 1 故宫建筑中“和”文化意蕴

故宫作为明清帝王居所,不仅是皇权的物质象征,其建筑形制本身即构成“至德至善”的伦理空间。中国

作者简介:房尚文(1978-)女,广东梅州人,副教授,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法学中国传统文化;岳尔雅(2006-)女,广东深圳人,本科,主要研究方向:数字媒体技术。

传统政治哲学讲究“天子承运于天，施德泽民”，这一道德意蕴深刻渗透于建筑命名与布局之中。沿北京城市中轴线一字排开的前朝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均以“和”字为共同后缀，构成独特的“和”文化建筑语汇。其中，太和殿与保和殿之“太和”“保合”，皆典出《周易·乾卦》“保合太和，乃利贞”<sup>[2]</sup>，“太和”是宇宙万物最圆融和谐的秩序，“保和”则寓含持守本体、会通融合之意，昭示唯有守正创新、使万物各正性命，方能基业常青。中和殿之“中和”出自《礼记·中庸》：“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sup>[3]</sup>，强调以不偏不倚之中道，达致万物和谐共生之境。

2017年北京初冬，习近平主席在故宫红墙黄瓦的映衬下向特朗普总统夫妇介绍中国历史，于太和殿前阐释“和”文化意涵，此举具有深刻的文明对话象征意义。

相较之下，中华文明早在商代即发展出独特的“和”文化基因。随着商代部族不断融合，不同图腾与信仰逐步纳入统一祭祀体系，形成了多神共处、和而不同的宗教宽容传统。汉唐以降，佛教、祆教、景教、伊斯兰教等相继传入，在“和”文化氛围中实现和谐共存，美美与共。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sup>[4]</sup>。在600年历史的太和殿前，中国向世界展示的不是零和博弈的霸权逻辑，而是“尚和合、求大同”的文明智慧。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时代价值，以开放融合的胸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开放包容的世界，正是中华文明对全球治理贡献的中国方案。

## 2 故宫玉器对美德的诠释

汉代许慎在《说文解字》对玉的解释是“玉、石之美者”<sup>[5]</sup>。与世界其他文明相比较，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独特而完备的独立用玉体系和传统。故宫博物院玉器藏品丰富，数量高达三万余件，品种繁多，工艺精湛。从红山文化的玉玦到良渚文化的玉琮，从战国秦汉的玉璧到清代的玉山子，从古老的岫岩玉到新疆和田白玉，再到近代的翡翠，囊括了许多时代的精品。故宫玉器制作精美，立意深远，不仅是实用器物，更承载了宗教、礼仪和道德功能。

(1) 儒家比德于玉的文化传统，发端于先秦而大成于后世。早在《诗经·秦风》中即有“言念君子，温其如玉”<sup>[6]</sup>之咏，至《礼记·聘义》更载孔子“君子比德于玉”的系统论述，将玉从贵重矿物升华为道德符号与

礼仪载体。据《聘义》所载，玉具“十一德”：仁、智、义、礼、乐、忠、信、天、地、德、道。此十一德几乎涵盖了儒家理想中的全部君子品性。

明清时期，随着儒家思想确立至高无上的官方正统地位，“以玉比德”的观念进一步制度化、生活化。《诗经·卫风》所谓“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大学》引之以释“明明德”，揭示了君子修身须经砥砺琢磨的艰苦功夫。故《礼记·玉藻》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君子于玉比德”<sup>[7]</sup>之制，佩玉不仅是身份标识，更是士人时时警醒自我、省察克治的道德镜鉴——行走时玉佩叮咚，以节步态；静处时温润在握，以正心性。通过这一“切、磋、琢、磨”的修养过程，士人得以由外而内、由器入道，最终臻于天人合一的至善境界。

(2) 玉是君子人格的物质载体。儒家以玉比德，赋予其“仁、义、智、勇、洁”五德，使抽象的道德理念获得了可触可感的物质形式。故宫博物院藏翠玉白菜品类丰富，玉质上乘，工匠依色赋形，巧琢天工，雕镂精微，承载着对君子人格的典范追求。翠玉白菜以天然玉材的绿、白两色巧雕而成，绿为叶，白为帮，清白分明。清代宫廷将翠玉白菜的色彩特征提炼为“清清白白”的道德符号，寓意男子廉洁自持，女子清白坚贞。其雕琢量材就质，顺应玉料天然形色，体现敬天惜物的匠心，正与君子“视万物皆禀天地之气”的伦理观相契——既知一丝一缕、一玉一木皆承天地之气，便不可暴殄天物。

(3) 玉为德政之征，亦是功业之纪。古代帝王以玉制玺，不仅因其材质之坚贞难移，更赋予其天命所归的政治哲学意涵——玉玺作为权力凭证，既是世俗权威的物化象征，更是君权神授的通天信物。儒家通过“以玉比德”的伦理建构，将玉的物理属性系统转化为政治德性的隐喻系统，使玉器成为衡量统治者道德修为的具象尺度。

故宫博物院藏大禹治水图玉山，即为这一玉德政治的巅峰之作。此器以新疆和田青白玉大料雕琢，原重逾万斤，乾隆帝命人依清宫所藏宋人《大禹治水图》为蓝本，由扬州匠师经十余年精心琢制而成，竣工于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堪称世界上现存最大的古代玉雕艺术品。乾隆朝素有稽古右文之政风，宫廷玉器制作尤重以器载道之旨；选择大禹治水这一题材，非仅为艺术再现，更是借圣王功业以寓政教——大禹疏九河，陂九泽的疏导智慧，体现了因势利导的科学精神；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忘我精神，彰显了先公后私的责任伦理；而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的叙事，则隐喻着统一多

民族国家的政治理想。通过这一巨型玉器的视觉呈现,乾隆皇帝不仅塑造了自身法先王、重民瘼的明君形象,更将玉从个人修身的道德载体,提升为帝国德政与历史功业的纪念碑。

### 3 故宫陶瓷中的道德教育意蕴

中国是陶瓷烧制历史最悠久的国家。在古代社会漫长的发展进程中,中国始终占据制瓷工艺的制高点,长期垄断瓷器制造技术,瓷器亦成为历代中国出口最重要的商品之一。中国陶瓷史是工匠技术创新、文化融合与东方审美交相辉映的辉煌见证。18世纪以前,瓷器在欧洲堪称奢侈品的代名词——1717年,萨克森选帝侯奥古斯都二世为筹备婚礼庆典,以600名全副武装的龙骑兵向普鲁士国王换取151件康熙时期的中国瓷器,此事在欧洲轰动一时。故宫博物院藏品中,中国古代瓷器所占比重最大,陶瓷器多达377440件/套,囊括了从新石器时代至明清、民国时期的陶瓷精品,时间跨度长达6000余年。可以说,这些陶瓷珍品记录了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完整历程,见证了工匠勤劳智慧的匠心精神,更承载着传统文化追求道德至美至善的深厚情怀。

(1) 陶瓷制作体现了对规则的极致追求。故宫博物院藏宋代汝窑珍品,堪称中国陶瓷史的巅峰之作,折射出宋代超凡脱俗的审美情趣与道德追求。汝窑之美,首先体现在对比例与曲线的毫米级控制,以及器型近乎苛刻的规整;其次体现在对玉质感釉色的极致追求——那是一种雨过天晴般的色泽,朴实无华却又纯粹到极致,温润如玉且内敛含蓄;更深层的,是对器物精神境界的极致追求,这与宋明理学追求天理、克制欲望以臻完美道德人格的理想遥相呼应。

(2) 陶瓷图案中的道德规范。中国古代陶瓷构建了庞大的“视觉教化系统”,以图像为编码载体,将伦理道德与社会价值渗透到日常生活之中。故宫博物院陶瓷藏品数量宏富,其中展现的美德典故与寓意吉祥的动植物纹样,使日常器皿成为道德教化的“移动教科书”。元代青花梅瓶绘有四爱图,表达对品德高洁之隐士高人的仰慕;明清官窑瓷器中大量出现以梅兰竹菊四君子、松竹梅岁寒三友为主题的图案,这些象征坚韧不拔、正义坚守、有节有度的植物题材,以物喻人,承载着君子气节的教化功能,表达了困境中坚持操守的高尚情怀。康熙年间,江南士人进献南宋楼璩《耕织图诗》,康熙帝命人重绘,并亲自撰写序文与题诗,雕版印行并广泛传播;清代瓷器上的耕织图,正是这一教化体系向器物的延伸,通过农夫劳作细节与农妇织布

场景的生动呈现,既体现了以农为本的治国理念,塑造了君主体恤民情、劝课农桑的明君形象,也弘扬了勤俭节约、辛勤劳作的劳动伦理。

(3) 陶瓷艺术中“和”文化的具象化。陶瓷的本质在于合——土与火合、方与圆合、技与道合,这种物理属性的“和合”特质,使其成为中华文明兼容并包、海纳百川精神的理想载体。元代疆域辽阔,空前的大一统格局为技术融合提供了政治基础:至元十五年(1278年),忽必烈在景德镇设立浮梁瓷局,将中原、西域及草原诸地的陶瓷名匠征调于此,造就了“匠从八方来,器成天下走”的盛况,开创了跨地域、跨民族的技术会通之路。

故宫博物院藏元代青花釉里红开光镂空盖罐,正是这一“大融合”工艺的巅峰见证。此器集多重文化元素于一体:其青花发色所用“苏麻离青”系波斯进口钴料,与国产铜红釉同施一器,需精确控制窑温温差在极小范围内,方能令青红二色并呈艳发,此技术难度在13世纪世界陶瓷史上堪称绝技;纹饰布局上,腹部主题纹样为汉族传统的缠枝牡丹与莲花,而满密繁复的构图风格则承袭蒙古贵族审美;器形借鉴了伊斯兰金属器的庄重轮廓,盖钮则以中国化的狮形呈现,将西域瑞兽转化为憨态可掬的吉祥符号;开光镂空技法既汲取了西亚金属器与玻璃器的装饰意匠,又融会了北方磁州窑的刻花与南方龙泉窑的露胎贴花技艺。

此罐之所以被称为“和”文化的物质载体,正在于其并非简单拼接异域元素,而是经由景德镇工匠的创造性转化,将伊斯兰造型、蒙古审美、汉地纹饰与中原技艺熔铸为新的艺术整体。它不但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文化交融结晶,更以和而不同的工艺哲学,诠释了中华文明对差异的包容与对统一的追求。

### 4 结语

中华文明绵延五千年而不衰,道德因素发挥了核心作用。儒家“仁义礼智信”等道德规范成为维系社会秩序的“软力量”,通过有形与无形的载体代代相传,构成了中华文明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与价值导向。中华文明历来重视“物以载道”,将抽象的道德律令熔铸于日常器物的形制、纹样、材质与使用规则之中,使物在无声中完成德的示范与约束。西周建立的列鼎制度即为典型:天子、诸侯、大夫所用鼎簋的数量、容积与花纹皆有严格规制,将伦理秩序固化为可触可感的具体器物。使用者观器而知位,明了守位即是修德;反之,越礼多用一鼎一簋,即被视为失德的明证。

这种重器传统实为重德传统的物化表征。《史记》

记载,周武王东征伐纣,兵至盟津而踌躇不前,因天命尚未彰显;直至殷商太师、少师怀抱祭器投奔,武王方确认天命已移,决心进军,一举成功。乐器之归附,象征着文化正统与道德合法性的转移。降至战国,周王室九鼎屡遭诸侯觊觎,问鼎之举背后,是对政权合法性符号的争夺。由此可见,文物在中国文化中不仅具有审美功能,更是道德律令与文化精神的物质载体,承载着超越其物理属性的文明重量。

中国传统治家智慧向有“道德传家,十代以上;耕读传家次之,诗书传家又次之;富贵传家,不过三代”之说,此语虽为后世综括之格言,然其思想实肇端于《孟子·离娄下》“君子之泽,五世而斩”<sup>[8]</sup>之诫,并与《周易·坤·文言》“积善之家,必有余庆”<sup>[9]</sup>的德性宇宙观深相契应。因此,家族之绵延不仅系于血脉之延续,更赖于道德资本之累积;推而广之,一国之长治久安,亦取决于公民社会之整体德性水准与价值认同。

故宫博物院所藏之历代物质文化精品,非徒供赏鉴之古玩,实为承载集体记忆、建构文化认同之物化传统。《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载叔孙豹论三不朽,以立德为最高之业;这些跨越时空的文物,正是立德之具象化与物质化。其作为连接历史、当下与未来的文化媒介,一方面通过物质性在场重构国人对历史情境与古人情怀的认知图式,另一方面则以其所铭刻的技艺匠心与伦理意涵,为当代中国人提供了追求至善境界的价值范型。在此意义上,博物馆之典藏不仅是过去的保存者,更是现在的规范者与未来的奠基者——经由对物质文化遗产的阐释与再阐释,中华文明之连续性得以在当代实践中重新激活,从而实现从家族德性到民族精神

的层级跃升与历史赓续。

### 参考文献

- [1] 中国博物馆协会官网. 国际博协特别全体大会通过新版博物馆定义[EB/OL]. (2022-08-25)[2023-03-01]. <https://www.chinamuseum.org.cn/cma/detail.html?id=12&contentId=12403>.
- [2] 《周易·乾》[M]//《十三经注疏》本. 北京:中华书局,1980:14(上册).
- [3] 《礼记·中庸》[M]//《十三经注疏》本. 北京:中华书局,1980:1632(下册,影印清阮元校刻本).
- [4]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312.
- [5] 许慎. 说文解字[M]. 陶生魁,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2020:12.
- [6] 《诗经·秦风·小戎》[M]//《十三经注疏》本. 北京:中华书局,1980:368(上册,影印清阮元校刻本).
- [7] 《礼记·玉藻》[M]//《十三经注疏》本. 北京:中华书局,1980:1482(下册,影印清阮元校刻本).
- [8] 杨伯峻. 孟子译注[M]. 北京:中华书局,1960:178.
- [9] 《周易·坤·文言》[M]//《十三经注疏》本. 北京:中华书局,1980:18-19(上册).

**版权声明:** ©2026 作者与开放获取期刊研究中心(OAJRC)所有。本文章按照知识共享署名许可条款发表。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